

十九世紀來華新教傳教士的翻譯策略與翻譯觀

——以米憐為中心的討論

司徒佳 Jia SI

復旦大學歷史系

本文以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 年成立）傳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以及他翻譯、編寫的多種中文宗教小冊為主體研究物件，擬展示十九世紀早期新教傳教士對華英譯作品的翻譯策略與翻譯觀，並進一步探討翻譯文本中所展現出的中西宗教對話、文化競爭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

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與白淑貞（Susanne Barnett）教授合作編寫了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基督教在中國：早期新教傳教士的著作》）一書，乃此研究方向的開山之作。基於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所藏原始文本的調查，多名學者對十九世紀早期來華傳教士的經典作品展開較為系統的研究，如基督教《三字經》、《張遠兩友相論》等。然而，研究者的目光多聚焦于單一文本，且多將文本作為翻譯的結果進行呈現，忽略了翻譯文本的內在結構系統及其創制的具體過程。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試圖從十九世紀早期新教傳教士“文本佈道”的整體佈局與系統結構入手，並將一手史料中的刊印文本與原始手稿兩相結合對應，以加強這一主題的過程研究。結合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作者在對米憐 1815-1821 七年間在麻六甲寫下的工作日志、報告、書信等資料的整體閱讀的基礎上，深入探討早期新教對華傳教的文本佈道策略以及中文翻譯寫作計畫的具體實施過程。

以全域眼光來看，米憐作為來華新教傳教士第一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的助手，對開展基督教“文本佈道”的宗旨與計畫有更為切實的實施理念。在米憐與廣州、麻六甲等地的華人助手合作完成的這十八種中文小冊中，約三分之二是宗教文本，另三分之一屬史地及社會倫理類。對於十九世紀早期的新教傳教士來說，宗教文本的翻譯與其他世俗類作品不同，帶有一個更為明確的計畫與目標，以符合“文本佈道”的宗旨。因而，對這一類文本的考察，更需將其放入一個相應的歷史背景與歷史語境中，以解讀其寫作主旨、作品內容，並考慮文本使用的場合及受眾。作為翻譯的仲介人物，傳教士的中文助手其作用十分關鍵。然而因史料匱乏，不容易得到具體資訊。本文則從米憐的倫敦會檔案手稿中揭示出一部分“中間人”的相關活動，使翻譯的過程研究更為明確。從翻譯史的角

度來看，傳教士所作的中文小冊亦在中外文化交流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米憐的作品來說，從源文本的選擇到目標文本的最終創制，經歷了中西語言接觸與中西文明對話的一個特定過程。因而，進一步分析其文本型態、比較其寫作主旨並討論其文本間性，將有助於深化我們對十九世紀中西文化交流過程中一些關鍵問題的理解。